

发展中的非洲中国学： 脉络、议题与特点*

黄 畅

【提 要】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发展与深化，非洲国家成立了大量中国研究中心，开展对当代中国的具体研究。非洲中国学的议题集中在中非关系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和“中国模式”研究，研究方法跳出传统汉学研究范式和欧美中国学的框架，从对中国的“观察”到非洲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具有非洲特色的中国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 非洲中国学 中非关系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研究 “中国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7.8

【作者信息】 黄畅，1989 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00101。

伴随中非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加深，21 世纪的中非关系更加紧密，中非间的人文交流也有了长足发展，相互认知也愈发深入。与此同时，非洲地区的中国研究也得以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开展，一批专门的机构和人才得以涌现。这一区域中国研究的蓬勃发展既反映出中非关系的发展深入，又为中非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智识助力。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薄弱。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是较早关注中非关系的学者之一，他于 1948 年出版了《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该书钩沉了中非交往历史，梳理郑和第六次、第七次航行与非洲的关系，为研究中非关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学者从国际关系史、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关注非洲中国学，李安山的《中非关系研究中国际话语的演变》对非洲涉及中非关系研究的部分中国学中心和智库的话语表述进行了阶段性分析；郑惟迪等的《从非洲思考中国：与另一个他者的相遇》（“Thinking China from Africa: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Other”）尝试超越“中国中心主义”和“中西二元”框架，讨论中国与非洲的“位置和位置性”；丹尼尔·拉奇（Daniel Large）等主编的《中国重返非洲：一种新兴力量与一个大陆的拥抱》（*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基于当代中非地缘政治格局视角，介绍了中国在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活动形式、政治动态、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以及西方的看法等，批判“中国争夺非洲论”“中国新帝国主义”等广受西方吹捧的论调，探讨研究

* 本文写作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登峰计划“海外中国学研究”支持。

中非新型关系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里·布罗德曼（Harry Broadman）的《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印的新经济领域》（*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结合中文档案，从非洲的“边界之外”“边界之间”“边界之内”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印在非洲的活动和影响；荷兰学者范·迪克（Meine Pieter Van Dijk）主编的《中国在新非洲的新出现》（*The New Presence in Africa*）探讨了当代中国之于非洲的意义；丹尼尔·拉奇的《中国与非洲：新时代》（*China and Africa: The New Era*）是2021年出版的探讨新时代中非关系史的最新论著。目前著述中直接提出“非洲中国学”（China/Chinese Studies in Africa）这一概念，并对非洲中国学的内容、方法有一定涉猎的，可见的仅有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究项目（Chinese Studies Programme）主任范莎娜（Sara van Hoeymissen）的《非洲中国学》^①这篇文章。因此，本文尝试梳理非洲中国学发展脉络，关注其研究议题与呈现的特点，以期进一步丰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内容。

一、非洲中国学的发展脉络

（一）21世纪以前：前中国学阶段

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关注度上都不及其他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洲大陆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绝大部分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因此，非洲对中国的研究跳过了传统汉学阶段，直接进入了当代中国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非洲对中国的研究内容零星且分散，主要关注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周恩来访非活动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苏丹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坚持在报纸上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运动。苏丹人民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解和阅读毛泽东撰写的革命文章。此外，自1956年埃及派遣4位学生来中国学习后，到20世纪60年代，14个非洲独立国家都曾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②大批在华非洲留学生对中国有了一定认识，撰写报道，为早期非洲中国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20世纪50年代中期侧重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南非《星报》（*The Star*）和《非洲共产主义者》（*African Communist*）、坦桑尼亚《旗帜报》（*Tanzania Standard*）、《赞比亚时报》（*Times of Zambia*）、《新尼日利亚人报》（*New Nigerian Newspaper*）等报纸大量关注中国对非援助活动。非洲政治家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戈翁（Yakubu Gowon）和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等人都曾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非洲非殖民化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20世纪50—80年代，非洲国家关注“古代中国”（old China）与“新中国”（new China）的区别，重点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历史以及中国对非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及中非关系的深化，非洲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从反帝反侵略所取得的成绩逐渐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成就。

（二）21世纪：中国学起步与发展阶段

非洲中国学虽然起步晚，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较之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但进入21世纪以

^① Sara van Hoeymissen, "China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21, pp. 201 - 209.

^② 李安山：《非洲留学生在华：历史、现实与思考》，沈晓雷译，《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

来，非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发展迅猛，研究机构数量激增。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学项目与高校的孔子学院剥离，成立单独的科研机构，对当代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强，研究水平稳步提高。目前，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机构有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三种类型，主要国家有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苏丹、博茨瓦纳等。

南非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非洲国家，2004年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成立，聚焦中非政治、经济、环境等议题，致力于推动中非的知识、思想与经验交流。除定期出版期刊、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举办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之外，中心还于2016年设立中国研究博士后项目，培养中国学问题研究专家。2013年6月12日，马蓬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Mapungubw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flection）设立中国文明研究项目，这是第一个以非洲人视角进行中国研究的项目，集合非洲智库、政治家、学者，耗时多年进行的“中国文明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项目囊括了中国文明、价值观、政治、经济、中非关系等内容，为南非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于2018年11月22日成立，将中非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心重点研究项目。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David Monyae）致力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此外，还有南非伦理研究所、南非政策研究所、南非金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南非人类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学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展开研究。

尼日利亚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非国家，2015年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of Nigeria）成立，旨在通过对中尼关系、中非关系的研究，加深中尼两国之间各种形式的交流，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中心充分发挥尼日利亚智库作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2016年11月30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和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和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主题研讨会；2017年10月18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办“中共十九大的全球意义及对非洲影响”专题研讨会；2018年12月14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意义、影响与经验”专题研讨会；2020年4月24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主题为“尼中合作：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研讨会，该研讨会鼓励尼日利亚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抗疫经验、执政经验，深化尼中合作；2020年11月3日，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在阿布贾举办“中非合作论坛20年：成就与展望”专题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规模较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尼日利亚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在野党人民民主党和全体进步大联盟等政党代表，尼日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阿布贾大学等机构的学者都积极参与上述研讨会。此外，该中心还创办了《中非简报》（*ChiAfrica*）期刊，致力于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化，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共出版了20期（目前因疫情暂停出版）。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是目前非洲中国学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著述涉及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内容。此外，尼日利亚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特设“中国在尼日利亚”项目，研究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为其主要研究方向，中心主任谢里夫（Sheriff Ghali Ibrahim）博士对中国的义务教育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减贫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是东非首个研究中国问题和中非关系的专业学术机构, 于2018年5月15日成立。该中心的战略目标是开启中非、中坦学者之间的交流, 促进两国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学习, 持续加强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汉弗莱·莫希 (Humphrey P. B. Moshi) 致力于研究中国如何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摆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 希望通过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经验, 助力坦桑尼亚实现现代化。

除了上述规模稍大的研究中心之外, 近年依托非洲大学开设的中国研究项目还有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项目”。此外, 苏丹喀土穆大学亚非研究所、加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等也都开设了研究项目。

非洲的中国学中心、研究机构与研究项目在2010年后数量激增, 体现了其与孔子学院剥离的尝试。自2013年南非成立非洲首个中国研究项目以来, 短短8年, 非洲已经有几十家机构开设中国研究项目, 创办了中国研究期刊, 发表了一批中国研究文章, 从语言学习转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及中非关系的发展。同时, 这些机构不断加强与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 如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非洲研究院建立学术合作关系, 南非约翰内斯堡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邀请中方学者参与中心的创立。

然而, 非洲中国学跳过传统汉学阶段, 直接在当代中国研究的框架下展开, 对传统中国的认识显然不充分; 又因研究经费大多依托欧洲政治学术组织, 人员严重不足, 实际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中国学特点。尽管如此, 非洲中国学还是提供了欧美中国学之外的若干中国研究的新内容、新特点与新范式。

二、非洲中国学的议题

(一) 基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中非关系史研究

对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是非洲中国学的重要内容。非洲学者致力于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探讨中国与非洲的古代联系, 有力地驳斥了欧美舆论和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对非洲是一种“新入侵” (new inroads) 的观点。^①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考古学教授菲利克斯·查米 (Felix A. Chami) 根据2005年在桑格巴尔的库姆比洞穴的考古发现, 结合中国、欧洲和非洲的史料, 指出库姆比洞穴发现的钱币为中国宋真宗年间的天禧通宝 (铸造时间约为1017—1021年), 进而将中坦交往史追溯至北宋时期。^② 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考古学教授马可·维加诺 (Marco Viganò) 通过考古发现, 鉴定并分析在埃塞俄比亚编号1040洞穴的两枚钱币分别为中国宋仁宗年间的皇宋元宝 (铸造时间约为1039—1053年) 和宋神宗年间的元丰通宝 (铸造时间大约为1080年), 从而指出中国与

① 例如201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由埃塞俄比亚主办, 非洲、澳大利亚、美国与中国学者参加的“探寻中国与非洲的古代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Exploring China's Ancient Links to Africa World Conference) 上, 就有多位学者从明永乐帝的对外政策、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角度探讨古代中国与非洲的联系。

② 详见查米2005年的考古报告: Felix Chami, "Identification Sheet of a North Song Chinese Coin Found by Dr. Felix Chami in the Kuumbi Cave, Zanzibar, in 2005" 以及埃塞俄比亚“探寻中国与非洲古代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章《埃塞俄比亚桑格巴尔库姆比洞穴》。

埃塞俄比亚东部在 1000 多年前就存在着一条贸易路线，他认为，“从公元 1000 年到 1450 年，中国人拥有先进的技术，对当时尚不发达的欧洲不感兴趣，经常与非洲进行贸易”。^① 索马里兰 (Somaliland) 文物部主任萨达·米尔 (Sada Mire) 博士指出，古代中国与索马里地区的贸易可以上溯至公元 11 世纪中叶，他通过在索马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非洲之角伊斯兰王国索马里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结合中非史料指出，古代中国与索马里沿海城镇的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促进了思想与文化的传播。^② 非洲生态学者柯蒂斯·亚伯拉罕 (Curtis Abraham) 在《中国在非洲的悠久历史》一文中指出中国与非洲友好往来的历史源远流长。他通过追溯古代中非关系史，探讨其对当今中非关系的影响，并结合中非史料和文献档案，指出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和第六次航行）已经到达了东非海岸，且明朝时期（1368—1644 年）中国商人和官员频繁到达埃及和埃塞俄比亚。^③ 大量考古学的发现以及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推进，引发了非洲考古学者对古代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非洲学者对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塞内加尔学者阿达玛·盖伊 (Adama Gaye) 的《中国与非洲：龙与鸵鸟》^④ 是非洲学者第一部较系统地描述当代中非关系的著作。加纳学者克维希·普拉 (Kwesi Prah) 主编的《中非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⑤ 是中非学者首次合作出版的论文集。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Gafar Karar Ahmed) 《以苏丹为例探讨 1949—1995 年的中国与阿拉伯关系》^⑥ 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万隆会议上对阿拉伯国家及非洲问题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承认苏丹独立以及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事业表达了肯定。他的《苏丹与中国关系：1956—2011》^⑦ 介绍了自 1955 年万隆会议两国领导人会晤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丹领导人就民族解放问题、苏丹南部问题等提出的中肯建议，梳理了苏丹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外交关系上的决策。尼日利亚学者阿拉巴·奥贡桑沃 (Alaba Ogunsanwo) 教授的著作《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 (1958—1971)》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非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⑧ 该书一直是非洲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非政策的基础文献。

(二) 从对中国的“观察”到非洲的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后非洲大多数国家纷纷走向民族独立，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成为他们的观察对象，“中国”作为可参照的“他者” (the other) 进入非洲学者的研究视野中，由此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伊瓦·德·蒂亚姆 (Iba Der Thiam) 和詹姆斯·穆利拉 (James Murila) 合作撰写的《非洲

① 详见维加诺的考古报告：Marco Viganò, “Identification of Two Chinese Coins Found in Ethiopia, ca 1040 and 1080 AD, Inner China”。

② Sada Mire, “Mapping the Archaeology of Somaliland: Religion, Art, Script, Time, Urbanism, Trade and Empire,”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Vol. 35, 2015, pp. 111 – 136.

③ Curtis Abraham, “China’s Long History in Africa,” *New African*, March 3, 2015.

④ Adama Gaye, *Chine-Afrique, le dragon et l’autruche*, Paris: L’Harmattan, 2006.

⑤ Kwesi Prah (ed.), *Afro-Chinese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ape Town: CASAS, 2007.

⑥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以苏丹为例探讨 1949—1995 年的中国与阿拉伯关系》，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6 年，未刊。

⑦ Gafar Karar Ahmed, *Sudan-China Relations 1956 – 2011*, Beirut: Arab Uninty Studies Center, 2016.

⑧ Alaba Ogunsanwo,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Africa 1958 – 1971*,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80 – 241.

与社会主义国家》^①一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非殖民化”入手，分析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非洲非殖民化的三大贡献：一是坦赞铁路的修建；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南非游击队运动、津巴布韦民族联盟游击队、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的援助，助力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三是中国共产党对非洲非殖民化运动起到巨大作用，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表态、对埃及的三大敌人（英国、法国、美国）的政治立场以及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态度，促使苏丹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阿卜杜拉·阿比德（Abudullah Abid）的《苏丹人在中国》一书以1949—1959年苏丹共产党档案为依据，阐明在苏丹获得独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对苏丹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苏丹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青年运动及工会组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该书还指出，苏丹共产党强烈要求苏丹政府增进与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联系，鼓励苏丹共产党员前往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②苏丹学者哈桑·阿里·萨欧利（Hassan Ali al-Sauri）的著作《中国与苏丹（1959—1989）》梳理中国共产党承认苏丹独立以来30年间中国与苏丹的交往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苏丹共产党影响深远。^③苏丹捍卫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委员会前秘书长艾哈迈德·赫尔（Ahmed Mohammed Kheir）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身份出访中国，他支持毛泽东革命路线，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敌对中国的苏联的斗争，他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④1967年1月，苏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苏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状况的看法》，指出中国的现实状况对苏丹左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影响着苏丹的某些政治决策。^⑤

尼日利亚学者阿拉巴·奥贡桑沃《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1958—1971）》的第二章“开辟新天地（1958—1959）”、第三章“调整和重新评估（1960—1962）”、第四章“战争、巩固与反思（1963—1965）”对中国共产党自1958年以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对中国对非政策进行了评价。^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1871—1958）》^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历程、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中国共产党在对非事件中的立场进行了评价。

尼日利亚前总统候选人、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帕特里克·奥克迪纳奇·乌托米（Patrick Okedinachi Utomi）的《中国与尼日利亚》^⑧详细梳理了中非关系尤其中国与尼日利

-
- ① Iba Der Thiam & James Murila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ristophe Wondji, “Africa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in Ali A. Mazrui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ume 8: Africa since 1935*, pp. 798 – 828.
- ② Medani Mohammed M. Ahmed (ed.), *Current Studies on Sudan*, Mohamed Omer Beshir’s Center for Sudanese Studies, Omdurman Ahlia University, 1998, p. 18.
- ③ Hassan Ali al-Saguri, “China and the Sudan: 1959 – 1989,” Sudan Foreign Relations Conference, Institute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hartoum, 10 – 13 March, 1995.
- ④ *Statement of Foreign Policy by His Excellency Ahmed Mohamed Kheir,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1958.
- ⑤ Hassan Ali al-Saguri, “China and the Sudan: 1959 – 1989,” 1995, p. 18.
- ⑥ Alaba Ogunsanwo,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Africa 1958 – 1971*,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5 – 179.
- ⑦ Alaba Ogunsanwo,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Africa 1871 – 1958*,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⑧ Patrick Okedinachi Utomi, “China and Nigeria,” in Jennifer G. Cooke (ed.), *U. S.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CSIS Press, 2008, pp. 39 – 48.

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他在文中肯定了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对非洲十国访问的历史意义，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这是非洲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课题。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非洲受到了一定关注。非裔学者维克托·维埃拉（Victor Carneiro Corrêa Vieira）的《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到“一带一路”倡议》^①一文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产生的缘起、发展过程及对非洲的贡献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开始，“国际援助”理念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尼日利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欧玛福姆·费赖迪·奥贡戈（Omafume Friday Onoge）的《朝向非洲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Towards a Marxist Sociology of African Literature”）一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毛泽东的讲话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当今世界，所有文化和文学艺术都属于特定的阶级，都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路线，并不存在超越阶级的艺术，或者脱离政治或独立于政治的艺术”这一观点可以服务于非洲文学研究。

对周恩来访非的研究。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几内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出访期间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情况，结合中国的援外思想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经验，形成了中国对非洲进行援助的援助理念。^②因此，非洲国家对此进行报道和研究，有多篇著述。非裔美籍学者艾迪（W. A. C. Adie）的《周恩来在热带非洲》^③一文对周恩来总理在非洲的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尼日利亚学者阿拉巴·奥贡桑沃的《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对周恩来总理访非活动给予了高度赞扬。该书指出，周恩来总理的访非活动是巩固中国与非洲关系的重要举措。^④

非洲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涉及中非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成就及其对非洲的借鉴意义。学者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角度，从宏观或微观分析中国的发展、中国所取得的经验及其与非洲的联系，研究成果颇丰。不难看出，他们逐步摆脱以一种“他者”视角“观察”中国的桎梏，彰显了非洲学者的主动“参与”，尤其是他们大量使用口述史学的方法，结合史料，体现非洲视角的独特性。

（三）“中国模式”在非洲的发展：当代中国研究

近年来，非洲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改革史的论述，尤其关注中国发展实践对非洲的借鉴意义。“中国模式”成为非洲中国学重点关注议题，非洲学者力图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找到非洲特色发展道路。

1.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脱贫经验对非洲的借鉴意义

非洲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十分关注，尤其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行40周年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文章。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专家艾祖伦（Ehizuelen Michael Mitchell Omoruyi）的《扩大

① Victor Carneiro Corrêa Vieira, “From Third World Theory to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Aid as 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ol,” *Contexto Internacional*, 201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88~389页。

③ W. A. C. Adie, “Chou En-lai on Safar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8, 1964, pp. 174-194.

④ Alaba Ogunsanwo,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Africa 1958-1971*, 1974, p. 126.

开放,促进繁荣》^①一文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盛赞中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背景下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呼吁非洲国家深度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他的另一篇文章《从对外开放政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②盛赞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肯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非洲的重要意义。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③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于非洲的启示》^④两篇文章通过钩沉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分析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及其对非洲的启示。

非洲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问题比较关注,尤其对中国的脱贫经验着力颇多。奥努奈居的《中国脱贫:对非洲的启示》^⑤对中国全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中国成功脱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呼吁非洲国家认真学习中国减贫经验,切实推动非洲减贫事业。马里前驻华使馆第一参赞、国际问题专家约罗·迪亚洛(Yoro Diallo)的《中国脱贫攻坚:创造载入历史史册的奇迹》^⑥对中国脱贫攻坚历史进程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以自己在延安参观的经历为例,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他认为,长征精神激励了中国人顽强进取,也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赋予了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对非洲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迪亚洛呼吁非洲国家“向东看”,学习中国智慧,借鉴中国经验。坦桑尼亚学者弗朗西斯·塞姆万扎(Francis Samvanza)撰文对中国精准扶贫政策进行深入研究,高度评价中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全面胜利,认为中国减贫经验对于非洲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非命运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疫经验、香港选举制度的修订、中国两会、中国共产党的反恐经验、中国发展模式等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肯定。尼日利亚主要报纸《领导者报》(*Leadership*)主编布考拉·奥贡西纳(Bukola Ogunsina)的《尼中关系与中非合作论坛20年》^⑦一文以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切入点,对习近平在2018年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八大行动”、王毅外长提倡的新时代中非合作模式给予了高度赞扬,指出尼日利亚应以此为契机,加紧落实北京峰会成果。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与中国共产党》^⑧和《后新冠疫情时代世界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⑨两篇文章中指出,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繁

① Ehizuelen Michael, “Open Wilder for Common Prosperity,” *People’s Daily*, December 19, 2018.

② Ehizuelen Michael, “From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Common Shared Prosperity,” *Leadership*, May 20, 2018.

③ Charles Onunaiju, “China’s Reform at 40 and Lesson in Many Pathways to Modernization,” *People’s Daily*, Dec. 20, 2018.

④ Charles Onunaiju,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What Lessons for Africa,” *Punch*, July 25, 2018.

⑤ Charles Onunaiju, “China’s Exit from Poverty: Lessons for Africa,” *The Nation*, March 10, 2020.

⑥ Yoro Diallo, “La Chine gagne la lutte contre l’extrême pauvreté Un miracle humain de plus,” *l’Indépendant*, 10 March, 2021.

⑦ Bukola Ogunsina, “Nigeria-China Relations and 20 Years of FOCAC,” *Leadership*, November 8, 2020.

⑧ Charles Onunaiju, “Post Covid-19 Perio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lueprint*, March 10, 2020.

⑨ Charles Onunaiju, “Post Covid-19 World Order and Humanity’s Shared Future,” *Blueprint*, March 27, 2020.

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先。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表现出的坚定决心，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绩，认为疫情未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影响完全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是大势所趋，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呼吁非洲各国借鉴中国抗疫经验。他在《中国高质量发展对全球经济繁荣的影响》^①一文中，通过梳理中国两会历史进程，对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中国十四五规划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文指出，2021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体现了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特色的政治体制，是中国人民着眼民族利益并在审视发展现状及国际环境基础上，为国家发展所做的坚定努力，中国的每一次重大政治议程都会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上迈出历史性步伐。他呼吁非洲国家借鉴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拉瓦尔·萨勒·梅达（Laval Sale Maida）的《中国两会及其对非洲的影响》^②一文以中国两会为分析对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两会为中非友好关系发展提供了保障。奥努奈居的《理解中国两会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③一文也以中国两会为分析对象，指出中国的两会制度极具中国特色，充分表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制度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值得非洲国家深思和借鉴。尼日利亚国际问题专家弗雷德·欧克舒库（Fred Okechukwu）的《中国如何发挥外债的杠杆作用及非洲如何做》^④一文肯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国情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对非援助和贷款给广大非洲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非洲各国不应被西方炒作的“中国债务陷阱论”误导，而应充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走出非洲特色发展道路。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的《中国新疆与一种去极端化的改良方式》^⑤一文指出，西方媒体所谓的中国“迫害”维吾尔族人的说法毫无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成功阻止了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蔓延，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远胜于美国的暴力反恐举措。他在《中尼建交五十年评价》^⑥一文中，梳理了自1971年尼日利亚与中国建交以来，中尼在经贸、教育、文化和军事领域取得的成绩。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阿嘎巴·哈里杜（Agaba Halidu）博士的《论香港选举制度修订》^⑦一文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扩大选举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制度及时正确、意义深远，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对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确保“一国两制”制度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

3. 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的《引领新时代：中国和世界》^⑧深入评析中共十九

① Charles Onunaiju, “Implications of Chin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Global Prosperity”, *Blueprint*, March 11, 2021.

② Laval Sale Maida, “China’s Two Sessions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People’s Daily*, June 1, 2020.

③ Charles Onunaiju, “Understanding the ‘Two Session’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China,” *People’s Daily*, March 19, 2018.

④ Fred Okechukwu, “How China Leveraged Foreign Credit and How Africa Can,” *The Nation*, November 18, 2020.

⑤ Sheriff Ghali Ibrahim,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and a Modified Way of Deradicalisation,” *Blueprint*, March 16, 2021.

⑥ Sheriff Ghali Ibrahim, “Assessing 50 Years of Sino-Nigeria Relations,” *Blueprint*, February 5, 2021.

⑦ Agaba Halidu, “On Hong Kong’s Revised Electoral System,” *Blueprint*, April 2, 2021.

⑧ Charles Onunaiju, “Heralding the New Era: China and the World,” *Peoples Daily*, November 14, 2020.

大报告，高度赞扬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展示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担当。他认为，“习近平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尼日利亚学者艾祖伦博士的《理解全球趋势与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讲话》^①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及中国坚持扩大开放的决心。尼日利亚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所前所长约瑟夫·戈尔瓦（Joseph Golwa）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非合作愿景》^②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蕴含着习近平主席的治国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思想的结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国家建设成功的原因。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奥努奈居在《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③一文中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宝典，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国家治理所有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有助于世界各国全面理解当代中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为全球治理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南非知名智库全球对话研究所所长费拉尼·穆坦布（Philani Mthembu）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催化剂》^④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提供无限选择》^⑤两篇文章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对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及对世界的贡献进行了全面梳理，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非洲发展的广阔前景。

三、非洲中国学的特点

第一，研究主体身份和研究目的日趋复杂。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中国学相关学者大多既有担任外交职务的经历，也有高校任职的经验，拥有政治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因此，他们享有查阅档案的便利，如外交部和贸易部档案、官方代表团访华报告、高级官员涉华信函，尤其是解密后的官方档案等，许多档案内容甚至在中国首次披露，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目的和动机并不是单纯从学术研究出发，而是夹杂了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

第二，研究视角（知识立场）逐渐由以西方为参照转向非洲本土，研究方法多样化。部分非洲学者曾以西方作为参照点来解释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将西方文献进行情景化解读。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学者更加重视本土史料，运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

① Ehizuelen Michael, “Understanding Global Trends and Xi Jinping’s Speech at Boao Forum,” *Peoples Daily*, April 23, 2018.

② Joseph Golwa, “‘Xi Jinping: Thoughts on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Prospects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Leadership*, December 25, 2020.

③ Charles Onunaiju,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ume III by Xi Jinping: A Review,” *Peoples Daily*, September 18, 2020.

④ Philani Mthembu, “The Chinese Initiative That Could be a Catalyst for Economic Recovery,” *Daily Maverick*, 24 May, 2021.

⑤ Philani Mthembu,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rs Myriad Options for Africa,” *Petoria News*, 3rd September, 2019.

加客观的认识。如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直接采访了大量当事人或相关人士，包括20世纪50年代访华的苏丹贸易代表团团长曼苏尔、长期在华工作生活的阿拉伯专家阿布·杰拉德、前苏丹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以及数位苏丹共产党员，这些口述史料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此外，也有学者使用多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将非洲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共执政理念进行对比。

第三，非洲生产中国知识的性质发生变化。21世纪以来，非洲的中国学研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中非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富，角度不同。正如奥努奈居在《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和非洲的第二次解放》^①一文中所说，非洲许多国家无视自身国情和社会发展程度，盲目模仿西方政治模式，从而无法推动国家发展。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经验正是非洲在现代化和包容性发展道路上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部分非洲学者希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能对中非关系的开展产生实质影响，这直接影响了非洲生产中国知识的性质，许多学者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徘徊。非洲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对决策者、商人和与中国利益相关人员产生影响。^②然而，学者不应当仅仅充当知识传递者的功能。

第四，非洲关于中国的部分研究经费来源于西方基金会资助，^③因此，部分中国研究存在盲目跟从西方观点的情况，在没有充分了解史实的背景下，容易受西方影响，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偏见。个别学者甚至撰文对中国共产党的防疫、涉疆、涉港、人权政策无理指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评，蓄意误导民众。这类文章的出现非洲还受到了少数人的拥护。针对这类文章，非洲中国学家积极发声，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确保中国走向成功。^④中非关系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缺乏全面、有深度的相互理解。非洲中国学家的回应及时有效，但是我们不仅需要非洲学者发声，中国学者也需及时把握非洲学者研究动态，适时做出回应。

第五，非洲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正在提升。我们需要将非洲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价值置于国际中国学的背景之下。非洲部分学者一直致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著述有力地抨击了西方抹黑中国的论调。如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谢里夫教授的《中国恐惧症和美帝国的衰落》^⑤一文就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对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分析，与特朗普政策进行了对比，从而抨击了西方抹黑中国、遏制中国的策略。非洲学者的这些发声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十分重要。因此，中国需要重视非洲中国学的意义与价值。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亚洲部分国家，近年来，开始有中国学者关注拉丁美洲的中国学研究。然而，对非洲中国学的关注严重不够。非洲中国学是国际中国学的一支重要力量，非洲中国学虽然因为国家发展原因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非洲政治家、学者积极参与，并在国际上大胆发声，对国际社会的中国观有着一定影响，对国内中国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 Charles Onunaiju, "Karl Marx, Socialism and Africa's Second Liberation," *Dailysun*, May 7, 2018.

② Arina Muresan, Philani Mthembu & Faith Mabera, *China-Africa: High Time for a Common Integrated African Policy on China*, Pretoria: Institute for Global Dialogue and UNISA, 2017.

③ 例如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绝大部分项目由西方基金会资助实行。

④ Sheriff Ghali Ibrahim, "Re: COVID-19 and China's Communist Authorities Have Gone a Step Too Far," *Leadership*, May 31, 2020.

⑤ Sheriff Ghali Ibrahim, "Chinaphobia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Empire," *Blueprint*, August 4, 2020.

四、非洲中国学学者的“位置”（position）与“位置性”（positionality）^①

目前非洲中国学呈现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非洲的中国学；另一种是非洲人的中国学。可能也有第三种情形，即不在非洲且不由非洲人进行的非洲中国学研究，例如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等一些国家进行的非洲中国学研究，研究者的身份可能是与非洲没有关系的欧洲/美国/拉美/亚洲学者，本文认为这种研究者身份既不属于非洲、研究者所处环境也不在非洲的情形下从事的中国学研究并不属于非洲中国学的内容，而属于对非洲中国学的再研究范畴。^②

多年来，欧洲学者或供职非洲的中国学中心，或在非洲的期刊上发表中非关系等相关研究文章，对非洲的中国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曾催生了在非洲的中国学的产生。在欧洲学术训练背景下，他们的研究在一种“自我”（欧洲的/西方的）与“他者”（非洲的/东方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大多倾向性较强，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很难突出非洲中心视角以及非洲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更难客观地看待非洲与中国的关系，甚至充斥着对中国的谩骂与批评。丹尼尔·拉奇发展的“丛林中的龙”（dragon in the bush）的这一话语表述将中国在非洲的出现与“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国威胁论”等西方抹黑中国的话语紧密联系。部分在非洲的中国学研究甚至为西方提供了学术情报。前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和斯文·格里姆（Sven Grimm）就将在南非的实地调研报告发回欧洲国家，成为欧洲国家对非政策的重要参考。因此，罗斯·安东尼（Ross Anthony）^③指出，非洲需要培养自己的中国学家，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非洲中心的研究视角。

在当前背景下，将非洲作为研究的中心，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框架下，以中非的“南南合作”为基础，以中国作为一种观照，突出非洲人主体性的非洲人的中国学研究更为必要与重要。肯尼亚活动家菲洛兹·曼吉（Firoze Manji）主编的《非洲视角下的中国在非洲》一书指出，现在的许多关于非洲的评论都集中在西方既得利益上，而独立的非洲分析家和活动家的声音却消失了，因此非洲视角下中国在非洲的出现则显得极为必要。^④因此，非洲的中国学家将研究内容集中在加强非洲与中国的谈判能力上，研究重点侧重与中非具体现实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博茨瓦纳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博茨瓦纳更好地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中获益，同时避免潜在的劣势。从非洲学者、外交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非洲的中国学家的知识生产的性质是基于基础研究 with 政策研究之间，更多的是充当智库成果，以期对中非关系的开展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尼日利亚伊洛林大学列缪尔·奥德（Lemuel

① 后现代转向下“客观性”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位置”与“位置性”这对概念，“位置”体现的社会角色，“位置性”则是在认识论层面使用的方法（参见 Naoki Sakai, “Positions and Positionalities: After Two Decades,” *Position: Asia Critique*, Vol. 20, No. 1, 2012, pp. 67–94）。本文在此借用这对概念探讨非洲中国学研究者的立场与方法问题。

② 在中国任教的越南学者黄石秀的《未确定的身份：中非研究中的一名离散学者》（T. T. Huynh, “Undetermined Identity: A Diaspora Scholar in China-Africa Studies,”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21, pp. 210–217）一文就指出了离散学者在研究中的身份不确定性。

③ 曾于2014—2018年担任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④ Firoze Manji &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Pambazuka Press, 2007.

Ekedegwa Odeh) 教授的《1971 年以来中尼经济关系动态》^① 等文章就是作为智库成果, 为政府对华决策提供参考。

五、结 语

正如博茨瓦纳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范莎娜所言, “非洲的中国学是一个有着特殊使命和研究议题的领域”。^② “非洲中国学”与“美国中国学”“欧洲中国学”“日本中国学”等概念一样, 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浮现, 成为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 它指的是非洲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等的研究。因区域研究而生成的一种可识别的非洲中国学的产生、起步与发展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受中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影响。非洲中国学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学术传统, 有其侧重关注的议题与特定的研究范式。近年来, 中非关系史研究、中非地缘政治格局研究等问题逐渐进入非洲学者的视野, 非洲中国学作为一支独立的学术力量出现, 产生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为非洲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平台, 其大量研究成果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树立具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但是, 我们也要注意非洲中国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 研究成果数量虽然在近十年来呈现激增趋势, 但缺乏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产生的学术影响、政治影响有限, 并未形成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学; (2) 虽然非洲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对本土史料的挖掘, 大量使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 使用访谈和田野调查等方式补充史料, 但是对本土史料的使用依然远远不够, 著述中依旧依赖西方史料及成果, 这也导致有时会出现一些史实错误; (3) 因非洲学者文化背景等原因产生了曲解和误读, 例如以非洲生育观批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明显有失公允; (4) 非洲各国之间学者交流、互动不充分, 中非、非欧的研究各自为营, 未能形成充分的对话。

(责任编辑: 高 媛)

^① Lemuel Ekedegwa Odeh, “Dynamics of China-Nigeria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971,”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Vol. 23, 2014, pp. 150 – 162.

^② Sara van Hoeymissen, “China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21, pp. 201 – 209.

**On Marcuse's Defense of Hegel's Thought:
Based o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Gao Haiyan Zhu Huanghe

Abstract: To fully understand Hegel'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Marcuse's related work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Marxist theor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This paper tries to grasp the ontological basis and substantiality of dialectics through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Marcuse's reconstruction of Hegel's concept of universality, historicity and rea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Hegel's rational dialectics and the revolutionary and critical nature of the social dialectic theory, that is, Marxist theory, and explores why Marx is regarded as the only and real successor of Hegel's ideologic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cuse.

Keywords: Hegel, *Reason and Revolution*, Marcus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China Studies in Africa: Issue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Huang Chang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 large number of China studies research cente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Africa, and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been carried out. African China studie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a Model". The research methods have transcended the traditional Sinology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n China studies. China's "observation" and Africa's "participation" have produced a new content and paradigm of China studies with African characteristics other than "European/American China studies".

Keywords: African China studies, history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a Model"

**From Cultural Encounters to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an European Sinological Masterpiece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Li Zhen

Abstract: The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ublished in Paris, France in 1785, collected and integrat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issionaries' research on sinology and became another masterpiece in a long line of encyclopedic European sinological works after th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view and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in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he book provides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 for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further examine their own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promotes objectiv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edicine in Europ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contributes to the intellectual dialogue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cultures in the 18th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of this book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on how to promot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o promot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he Covid - 19 epidemic.